

此“博物”抑或彼“博物”：这是一个问题

彭兆荣

[摘要] “博物”是一个使用广泛、意义多样的指称和概念，并与“博物学”、“博物志”、“博物馆”等词语构成密切关系。然而，中西方凭附在这些概念、模式和学科中的意义大相径庭。本文对此进行了粗略考释、梳理、比较和分析，提出在我国使用“博物体”的概念和模式；认为这不仅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宏扬，而且对尊重世界多元文化具有特殊意义，对第三世界也会产生样板性作用。

[关键词] 博物 博物志 博物学 博物馆 博物体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0890 (2009) 04 - 001 - 08

一、中西方“博物”谱系

“博物”、“博物馆”等概念和模式早已为人熟知。广大民众和多数专业人员在认知上大都没有疑义。然而，这些概念事实上充满歧义；至少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博物”与西方“博物”以及博物馆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二者的互译、互疏是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这不仅是一个概念的差异问题，其中涉及到不同的分类、不同的认知模式和知识体系。而这些差异并未引起学界的关注。因此，有必要做一个谱系的辨析。

检讨博物（馆）的概念，我们首先要对我国传统的博物志（学）与西文中的 Natural history 做一个比较和梳理。当下的学界大都将二者互译，笔者认为，这不妥当；有削足适履之嫌。

福柯在《词与物》中对人文科学的知识体制进行了所谓“考古学”的探讨，揭示了在17世纪中叶和19世纪初发生在西方文化认识论中两大巨大的断裂。西方理性在发展过程中经历的第一次断裂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终结和古典时代的开启，标志着阐释被分析所取代——词与物从同一走向

分裂。第二个断裂则是古典时代的终结和现代的开端，人类学以及所代表的整体观产生，使人文科学的研究领域被拓展、打开。换言之，知识的原始体系具有博物学的逻辑，分析时代产生了断裂，复又在现代人类学所代表的人文学科中得以复归。

有意思的是，福柯的人文科学“知识考古”谱系的开始却援引了博尔赫斯（Borges）作品中一段“惹得他哈哈大笑”的关于“中国某部百科全书”的分类体系：“动物可以划分为：1. 属皇帝所有，2. 有芬芳的香味，3. 驯顺的，4. 乳猪，5. 鳗鲡，6. 传说中的，7. 自由走动的狗，8. 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9. 发疯似地烦躁不安的，10. 数不清的，11. 浑身有十分精致的骆驼毛刷的毛，12. 等等，13. 刚刚打破水罐的，14. 远看像苍蝇的”。而“中国某部百科全书”正是我国的博物志代表作《山海经》（也有学者认为是一部以讹传讹、我国古代并不存在的所谓《天朝仁学广览》）。不过，这种“百科全书”式的目次分类，倒真切地反映和表现出我国博物志特殊的知识体系和认知体系。张华在《博物志》中开宗明义：“《河图括地象》曰：地南北三亿三万五千五

[作者简介] 彭兆荣（1956-），男，江西泰和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 厦门，361005）

参见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参见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前言”。

百里。地部之位起形高大者有昆仑山，广万里，高万一千里，神物之所生，圣人仙人之所集也。出五色云气，五色流水，其泉南流入中国，名曰河也。其山中应于天，最居中，八十城布绕之，中国东南隅，居其一分，是好城也。”

西方确定“自然史”的原则是：自然是一个整体，人介乎其中。在古典时期，“我”就是“自然”，我与自然同在——个体通过感受整体存在而存在——“我思故我在”。随着笛卡尔机械论的衰落，“人”与自然分离，人的历史出现了，自然的历史也出现了。这构成了后来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逻辑范式。历史的叙事成为自然的有机部分。从16世纪到17世纪中叶，所有存在一切有关自然的都是历史：贝龙的《鸟类本性史》，迪雷的《植物的奇妙历史》，阿德罗芬弟的《蛇龙的历史》等。历史成了一切看得见的物以及符号的错综复杂和统一结构……一个生物的历史就是这个身处把它与世界联系起来的语义学网络内的生物本身。显然福科为我们做了精致的西方式 natural history 的考述。

在我国，情形却不同，我国的博物志（学）与西方 natural history 的认知逻辑迥异。我们不妨也做一个“知识考古”。

（一）古代汉字中的“博”与“物”

甲骨文中没有“博”，可金文中有“博”。其义有：

1. 博。金文字形解释：形声。从十，專(f)声。“十”古文盾字之简写。“專”有分布之义。或从干，或从戈，或从厂，均为搏斗之搏的异文。本义：搏斗，获取，得到。金文通薄，搏二字，后引申为广泛，多，普遍。如：以追博戎。如《四十二年来簋》搏伐獫狁。《虢季子白盘》敦搏等。

2. 借为搏杀之搏。《说文》：“博，大，通也。从十，从专。专，布也。”徐锴系傳作“从十、专。剪，布也，亦声。”段玉裁注：博，大通也。

凡取于人易为力曰博。此后的《辞源》《辞海》《汉语大辞典》《汉语大字典》的解释多沿用和扩充《说文》中的意思。与今义接近，不累赘。



甲骨文中没有“物”，金文中没有“物”。

1. 解字。𠄎象表形，𠄎象末端刺田起土。

一举末起土为一墩，墩与𠄎（勿，卜辞中用为否

定词）古音同，且𠄎、𠄎形近，故字后世亦隶定为勿，由起土而训为土色，色、形色经传多借“物”为之。《左传》成公二年：“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物土即相土色。郑司农注《周礼·草人》：“以物地占其形色”物训色则自非一色，引申之得为杂。《周礼·司常》：“杂帛为物。”甲骨文物作

𠄎，或从牛𠄎皆谓杂色牛，无作否定词用

者，西周金文则全用作否定词。如孟鼎之：“𠄎

废朕命。”召伯虎簋之：“𠄎敢对”皆是。《说文》：“万物也……从牛。勿声。”

2. 释义。一：杂色，杂色牛。《说文》：“物，

张华《博物志》卷一。

参见福科《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前言”。

四川大学历史系古文字研究室方述鑫等编《甲骨文金文字典》，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

见许慎记，徐锴等校订《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出版，民国25年（1936）。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

《说文解字注》[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经韵楼藏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勿声。”按：“物”之本意为杂毛牛。〔清〕段玉裁注：物，万物也。牛为大物。牛为物之大者，故物从牛。与半同义。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戴先生原象曰周人以斗牵牛为纪首。命曰星纪。自周而上日月之行不起于斗，牵牛也。按许说物从牛之故。又广其意如此。故从牛。而在我国的博物志中，物有“物性”、“物理”、“物类”、“物产”等。与“博”相同，“物”的引申意义非常多，1986年11月上海辞书出版社版的《汉语大词典》多达14种。而1988年由湖北四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等出版的《汉语大词典》更是多达18种。不赘述。

（二）古代汉字中的“博物”

在一般的词典中，“博物”的意思主要有：

1. 通晓众物。汉桓宽《盐铁论·杂论》：“桑大夫据当世，合时变，推道术，尚权利，辟略小辩，虽非正法，然巨儒宿学，恶然大能自解，可谓博物通士矣。”宋欧阳修《笔说·博物说》：“草木虫鱼，《诗》家自为一学，博物尤难。”清徐发《蚓庵琐语序》：“姬公多艺，子产博物，自古而然。”此义延伸出通晓各种事物的人。

2. 指万物。唐玄奘《大唐西域记·摩腊婆国》：“昔此邑中，有婆罗门，生知博物，学冠时彦，内外典籍，究极幽微。”宋苏轼《以石易画晋卿难之复次韵》：“欲观博物妙，故以求马卜。”

3. 旧时对动物、植物、矿物，生理等学科的统一统称。

我国早期典籍中的“博物”出现在《左传·昭公元年》中，即形容郑国大夫子产通晓众物。原文作：

叔向出，行人挥送之。叔向问郑故焉，且问子皙。对曰：“其与几何？无礼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

晋侯闻子产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贿之。

又《孔丛子·嘉言第一》中称孔子“博物”。原文作：

夫子适周，见苾宏言终退。苾宏语刘文公曰：“吾观孔仲尼有圣人之表。河目而隆颡，黄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龟背，长九尺有六寸，成汤之容体也。然言称先王，躬履谦让，洽闻强记，博物不穷，抑亦圣人之兴者乎？”

又《孔子家语·辩政第十四》中孔子亦称子产“博物”。原文作：

子贡闻于孔子曰：“夫子之于子产、晏子，可为至矣。敢问二大夫之所为，目夫子之所以与之者。”孔子曰：“夫子产于民为惠主，于学为博物；晏子于君为忠臣，而行为恭敬。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爱敬。”

（三）关于“博物志”

我国熟知的最早以博物志为名者当属晋张华（232～300）的《博物志》。内容包括：地理（地、山、水、山水总论、五方人民、物产）；奇异〔人的部分：外国、异人、异俗、异闻〕，物的部分：异产、异兽、异鸟、异虫、异鱼、异草木〕；物类（物理、药物、药论、食忌、药术、戏术）；地方（方土、服食、辨方土）；考释（人名考、文籍考、地理考、典礼考、乐考、服饰考、器名考、物名考）；杂陈（史补、杂说、佚文译）等。王嘉《拾遗记》言张华：“摭采天下遗逸，自

参见张华《博物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年版。

桓宽：《盐铁论》，乔清举注释，北京：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页。

欧阳修：《欧阳修集》，沈丽华等解评，山西：山西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58页。

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小说家类》，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版，《蚓庵琐语》一卷，第112页。

玄奘：《大唐西域记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4页。

苏轼：《苏轼诗集（全八册）》，清·王文诰辑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年版，卷三十。

《左传》，刘利等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98页。

董仲舒，孔鲋：《春秋繁露·孔丛子》，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113页。

刘乐贤：《孔子家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

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闾里传说，造《博物志》四百卷，奏于武帝。”后来宋李石《续博物志》、明游潜《博物志补》、董斯张《广博物志》等皆仿此而作。

从我国传统的分类体制看，博物志是正统学问和分类“经史子集”的异述和补充；也是正统学问中遗失的重要部分。《山海经》可视为博物志范本。有意思的是，“博物志”因内容怪异而被当作一种叙事体裁，即所记皆异境奇物及古代琐闻杂事。张华遗留了故事性很强的非地理博物性的传说，如《八月浮槎》、《东方朔偷桃》等。鲁迅评价之“刺取故书，殊乏新意”。（《中国小说史略》）《博物志》开始入杂家类（《隋书·经籍志》），两《唐志》改入小说家类。虽然如此，但《博物志》仍不失为志怪小说中独具特点的一种体裁，对后世也很有影响，形成文言小说的一个流派。今存宋周日用、卢氏注十卷本、《四部备要》本、《古今逸史》本、《广汉魏丛书》本、《格致丛书》本、《四库全书》本、《稗海》本、《快阁藏书》本、增订《汉魏丛书》本、《子书百家》本、又纷欣阁丛书本附（清）钱熙祚辑逸文一卷、1980年中华书局《古小说丛刊》范宁校证本。如果沿此线索，金庸、梁羽生等小说并入同类亦未尝不可。

简言之，中国的博物、博物志、博物学原为正统经学的“异类补遗”；大抵属“乡土知识、民间智慧”之范畴；颇符合今当下“活态文化”之说。同时，它又是一种特别、特殊、特定的表述体裁。

二、西方“博物学”和“博物馆”

西方的博物学指一门内涵丰富的综合性学科，包括天文、地质、地理、生物学、人类学等学科的部分内容。早期的博物学大致始于18世纪之前，有名的博物学家有布丰（1707~1788）、林奈（1707~1778）、居维叶（1769~1832）、拉马克

（1744~1829）、赖尔（1797~1875）、华莱士（1823~1913）、法布尔（1823~1915）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达尔文（1809~1882）也是著名的博物学家，他的“进化论”正是人类学学科产生的学理依据。

早期的博物学大致可归入“自然科学”的范畴。今天的生物分类学、地质学、比较解剖学、进化生物学、生态学和动物行为学都与之分不开。20世纪50年代前，博物学几乎是数理学科以外各学科的全部。随着科学分类的不断细致化，博物学逐渐地被“分析化”。

从西式的知识谱系的发展线索看，简单地将西方的博物学划入自然科学似也不准确。在西方，自然与文化（nature/culture）并未见得泾渭分明。比如西方早期的“历史志”完全就是博物志，只要看一下“历史之父”西罗多德的《历史》，大家就会同意这样的看法。

值得反思的是，当我们用中国传统的“博物”概念去翻译、对应、阐释和套用西方的“博物学”、“博物馆”时，便出现了几个明显失误：1. 西方的经学传统自成一范，其特征之一就是分类细致和逻辑缜密，尤以在自然科学方面。将 natural history 和 Museum 译为“博物（学）馆”造成历史性的误会。2. 我国传统的“博物志（学）”在价值体制、知识分类和呈现形制上与西方大相径庭，属于正统经学以外的特殊体制和体例。3. 用同一个既不是中国传统的博物志（学），也不是 natural history 和 Museum 本义去对应，便出现三者原本非一物因用同一个语词而误以为一物的窘境和尴尬，从而导致认识上的困境。

以“博物馆”为例，从西文词语的考释可知，Museum 的出典有两个潜匿的意义和指喻：词源上源自古希腊的缪斯（Muses）——专门掌管诗歌、艺术和科学的女神。“音乐”（Music）也与之同源。在古希腊神话传说，特别在荷马史诗《奥德修纪》里有详细的记述。缪斯原是一位歌唱女神，

王嘉等：《拾遗记·唐摭言》，吉林：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77页。

《博物志》被列入“子部”最后一类“小说家类-琐记之属”。

参见李学勤、吕文郁主编《四库大辞典》，“博物志”，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

参见叶舒宪、彭兆荣、纳日碧力戈合著《人类学关键词》之“历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后来成为诗歌、艺术和科学的总管。她的化身从一位演变到三位，最后定位于九位。古希腊时期，Museum原指缪斯庙，即专门祭祀缪斯的庙宇，也是用于收藏与女神掌管的艺术品场所。古希腊时期的各个城邦都有缪斯庙。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是建于公元前280年的亚里山大城的缪斯庙，它对希腊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被认为是现代博物馆、美术馆的先驱。

Museum有一个重要的指喻，即与“记忆”联系在一起；缪斯的母亲正是记忆女神。所以，无论是从博物馆的字源考据还是意义考述，“记忆”都是一个重要的工具性概念。据此，博物馆的重要功能之一就在于使参观者通过知识将过去、现在和将来完整地联接在一起的记忆过程，而非仅限于“物”的收藏和展示。

在对博物馆“过去”的记忆上，有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诠释——博物馆所展出的器物具有“死亡”的意思；博物馆收集器物的过程可被看作是一个使器物与生命相互脱离的过程。阿多诺（Theodor Adorno）认为德语 museal即“像博物馆那样”（museum like），这个词描述的事物与观者之间不再有至关重要的联系，所表现的是“死亡”的过去。它们被保存下来，是人们出于对历史的尊重，而不是因为现代社会需要它们。

西方的知识传统，促使博物馆理论沿着自己的线索发展，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博物馆学，并有着完整的理论谱系。它与 natural history有一些历史关系，却完全不是一回事。博物馆理论认为：“博物馆是我们的文化景观中的一个主导性特征，它们形成了我们对历史和自身最为基本的设想。”

现代博物馆的理念和概念大致有如下几种为代表：

1. 圣地的理念。“在圣地范式中，博物馆具有治疗的潜能。那是一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神圣

之所。博物馆的藏品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博物馆之所以能够成为民众崇拜的对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后来成为博物馆的古代文明遗址大都是原始人民举行祭祀仪式的地方，比如教堂、宫殿以及古代庙宇。人们在那里举行神圣的仪式以纪念他们的祖先、神圣、神灵，或与那些特殊的历史事件、伟大的战争、祖先的起源等相关联。观众和游客在那个特定的环境和空间也有缅怀、回忆的含义。

2 殖民主义范式。现代的博物馆事实上是以西方的博物馆为模式，也因此具有不言而喻的殖民化色彩。许多批评家认为，现代化的博物馆是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父权结构”为特征所形成的特殊的文化样式，而博物馆正是殖民主义通过“他者”的意像以确定和确认“我者”的空间和场景。从这个意义上说，博物馆就是殖民化的空间范式，具有强烈的政治权力性“话语”特征。虽然，在世界范围内，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再呼吁归还被殖民者和帝国主义抢夺的文物给原属地，并将它上升到“基本人权”的高度，可是迄今为止，仍收效甚微。2009年2月对八国联军抢夺的两件中国文物“兔首”、“鼠首”的拍卖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3 资本价值。博物馆既是一个收藏的地方，也是一个产业。既然是一个产业，就必然受到资本化市场导向的制约，这个特点越是在当代就越明显。在商业社会，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作为商品交换和出售。博物馆有时以其特有的严肃性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博物馆的收藏品与展出其实与商品市场有着内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商品价值的浮动性来看，民众对某一种、某一类遗产的兴趣和关心必定附和当时的社会价值系统的变化，出现了隐晦的市场动态（通过民众在某一个特定时间内的“时尚”来反映）和明确的市场动态（比如文物拍卖行业就直接根据文物的

Moore, Willard B. connecting the Past with the Present: Reflection upon Interpretation in Folklife Museum, In P. Hall and C. Seemann (ed.) Folklife and Museum. 1986 PP. 51 - 58

珍妮特·马斯汀：《新博物馆理论与实践导论》，钱春霞等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176页。

珍妮特·马斯汀：《新博物馆理论与实践导论》，钱春霞等译，第3页。

珍妮特·马斯汀：《新博物馆理论与实践导论》，钱春霞等译，第11页。

市场价格变化实施其商业行为)。

4. 后博物馆。后博物馆范式被认为是一种最具希望的博物馆范式。它是“反思时代”时代的产物，这种范式试图通过政策的革新，包括诸如议程、策略和决策的制定，对遗产资源的重新分类、评估等，打造博物馆的全新形象。换言之，对传统博物馆的推动力进行新的调整和改变，以建立各种文化的共同空间。让全世界不同文化有机会平等地在一个平台上进行交流和互动。也是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之下，新的博物馆样式层出不穷。尤其值得肯定的是，那些遗产的创造者、认同者和传承者，那些原住民可以主人的身份通过不同的博物馆样式自主性地展示和处决他们的遗产。这样，博物馆的传统原则、主旨等也都随之发生的根本性的改变。

5. 发明遗产。博物馆的收藏被认为是对历史“碎片”的重组。多样性、变化性等不仅经常用来描述代表后现代的社会性质，还用来指后现代地方的特点。这种特点经常将重新发现和发明合成到设计理念和建筑模式中。“对传统的永远更新的诠释……不是保护过去的碎片，而是重新组织，重新修复和重新诠释”；从这个意义上说，博物馆只不过是“收集不同事物的盒子”。对于人们所熟知的博物馆以及文物展示其实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历史物语”，值得认真探索。因此，博物馆的概念，博物馆的形态，博物馆的历史记忆，文物的“非真实的真实性”等，都成了博物馆学、人类学研究关注的重要内容。

三、西方博物馆与中国“博物体”

以上的梳理使人们有一个新的认识，即我国的博物、博物学具有自己的发展脉络，严格的说，中国传统并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博物馆范式和模式。中国的文化本质上讲究“天人合一”的和谐，甚至与国家命运、君臣安危、人民生活等相属相联。张华《博物志》之“山水总论”如是说：“五岳

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赏封内名山者，通灵助化，位相亚也。故地动臣叛，名山崩，王道讫，川竭神去，国随已亡。海投九仞之鱼，流水涸，国之大诫也。泽浮舟，川水溢，臣盛君衰，百川沸腾，山冢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小人握命，君子陵迟，白黑不别，大乱之征也。”所以，笔者认为，从我国博物学的历史、理念和实践来看，更适合用“博物体”的概念，其核心是人与自然同体互通，共同参与生命体验、生体实践和生产活动，人的主体和客体相融洽。这与西方博物馆模式中的主客体二元分离不同。与现代的诸如“自然博物馆”、“生态博物馆”也不相同；当代西方的博物馆理念中虽然加强了地方、原住民等的整体保护为原则的博物馆，仍与我国的“博物体”有很大的距离。

在西方，博物馆被民众所接受的历史比其所展示的文物所表现的历史要晚近得多，它大约产生在19世纪初叶。它的产生开创了一个特殊的制作历史形象工作。人们通过搜集文物，以器物、形具的展示等方式对人类的过去进行发明和重构。一方面，人们通过博物馆事业对人类的遗产，特别是文物进行搜集、修复和保护，使那些濒临灭绝和毁坏文物得以留存。另一方面，由于博物馆对文物特殊的展示和保护工作，通常将文物搬移出文物的历史现场，并按照专业的分类进行重新排列，这就意味着博物馆所展示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属于建构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博物馆对历史的重新发明（the museum's reinvention of history）被认为是对历史原义的一种威胁。”而在我国的博物体中，人、物、身体、环境、地方知识、民间信仰等完整地结合在一起，并没有根本性的分离，也不需要另外建立一个独立的展示空间去展示某一类器物、技术。毫不讳言，我国现行的一些做法完全属于“西式博物馆”的套路。

在与西方博物馆的历史比较中，我们发现，

参见珍妮特·马斯汀编著《新博物馆理论与实践导论》，钱春霞等译，第11-26页。

See J. E. Tunbridge and G. J. Ashworth *Dissonant Heritage: The Management of the Past as a Resource in Conflict*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96 p. 17.

张华：《博物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5年版，第127页。

Maleuvre, D. *Museum Memories: History, Technology, Art*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

我国的博物体的历史自成一范，可惜没有很好进行总结。西方的博物馆包括着几种指喻：1. 展示性博物馆的滥觞于欧洲，特别是主导世界历史的“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工业革命”、现代国家形态、资本主义发展等，使现代博物馆兼有某种“话语性”意义。2. 博物馆对文物的搜集和展出不同程度地将文物特殊的历史、族群、生态等的多样性隐去，使之受制于某一种历史价值。人们可以这样拷问：“在博物馆里展示的物化历史是真实发生的历史吗？”博物馆中的文物原本有其原生性和归属感，然而，当它们被离开（包括购买、捐献、收藏、转移、盗窃、掠夺等合法与非法手段）历史的现场后，其原生意义大半已经丧失。3. 当博物馆行业与专业形成一种知识体系时，它也就形成了一种独立的专业。换言之，博物馆参与了社会理性和知识体系的建构，并通过这种建构获得了对事物的社会价值的控制和调节。许多现代国家在建国伊始，大都建“国家博物馆”

以树立新国家形象。4. 博物馆具有怀旧的明显特征，并通过观众和游客的现场观摩、欣赏、教育和根据个人的经历、经验、背景、专业知识等的主观参与实现了怀旧的性质。其中包括两种实现途径：

A、博物馆根据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以文物的方式呈现历史的场景，比如欧洲的许多博物馆都展出了殖民时代不同国家和民族的遗产，使人们感受到昔日殖民主义的“辉煌”。

B、专业人员通过经院式的知识和技术将文物进行分类，以达到对过去时代的价值区隔和凸显，特别是其中日常生活的器物展示与表达，唤起人们对过去的怀旧情感。

博物馆对物的展示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历史价值，形成了一个历史演变的实物谱系。然而，不同时代的博物馆功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以法国的卢浮宫为例，通过对它的历史变化的回顾可以清晰地看出其社会价值的变化轨迹。

西方博物馆发展的基本线索

时间	群体	特征	例证	功能
14 - 16世纪	贵族阶层：统治者、大商人等	把博物馆当作古玩好奇和收藏的地方	老卢浮宫	为追求声誉和炫耀，如从异域、异族掠夺和购物等
17 - 18世纪	精英阶层：科学家、哲学家及主要收藏者	系统化的展示知识及分类	阿斯莫仁 A shmolean	用于专业性知识的教育和专业研究以理解殖民背景
19世纪	中产阶级	规模化的博物馆形成以展示高贵	近代卢浮宫	配合社会和民主的精神，教育作用，商业化
1960年代起	社会民众	教育、社会活动，公共场所	多数大型公共博物馆	知识传播的途径，对社会民众产生作用，主题性博物馆更细致等

从西方博物馆的演变线索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博物馆的主要功能表现在：

* 普遍的教育程度。这是保证对文化理解的基本条件，使参观者可以达到对特定族群的历史、自然以及世界上道德多样性的理解。

* 以自己独特的理由保存对过去的认知和记忆，并在过去和现在之间通过博物馆的机构方式建立起逻辑纽带。其中一个明确的功能就是唤起人们怀旧的情感。

* 增加塑像认知能力。参观者通过对博物馆实物形态的了解，并根据自己母体文体的知识背景，将某一个地方的实物形象投放到一个更大的认识范围。

* 美感的欣赏和体验。通过对博物馆收藏品和实物的了解，有助于增强参观者的好奇感，并从中获得新的发现的满足感。

* 娱乐和轻松的氛围。博物馆可以为游客提供一个地方性空间，在那里，游客可以充分享受

他们的时光，而且经常是与家人或朋友来共同分享快乐时光。

博物馆有一个基本的功能，即它能够以实物形态营造出“历史模仿的氛围”，使观众有身临其境的现场感觉。这种感觉对于那些外国、外族、外地的游客来说大有裨益，因为他们可以直接通过场景、实物、符号等与自己所熟悉的社会和文化进行比较，从而提高类似“文化相对主义”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民族和地方的文化传统，提高保护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认识和意识。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博物馆建设和管理制度上都走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前面，这就很可能对第三世界的旅游发展和博物馆建设事业起到一个对“样品的模仿”作用，而成为事实上的后殖民主义“文化再生产”的产品。这就需要我们引起高度的警惕。

博物馆与“文物”是一个紧密相联的整体。人类与其他生物物种的差异之一在于人类对历史和记忆的贪恋，这种贪念在“物”的表现上就是特殊的收藏形式。其实，许多种类动物也有

“收藏”的特点甚至是癖好，但那都属于生存本能和繁衍的需要，未达到收藏文化的层面，比如动物在冬季到来之前必须存贮足够的食物以对付冬季缺乏食物的需要。人类的收藏则不然，正如学者所说，人类的收藏与文化一样悠久，一方面文化创造了收藏（collections），另一方面，收藏本身也创造了文化。西式博物馆的这种关系在传统的中国博物学中表现得并不明显，我国传统的博物学主张“天人合一”、“物我同一”。

概而言之，从现在博物馆（学）发展来看，我国现在贯彻、实践的主要是西方的理念、西方的理论、西方的知识、西方的模式；而我国传统的博物学分类、博物志知识、博物体价值和实践范式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笔者认为，重视中国特色的博物学传统、博物体践行不仅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宏扬，对尊重世界多元文化具有特殊意义，对第三世界也会产生样板性作用。

[责任编辑] 宋俊华

Grabum, H. N. A Quest for Identity. In Museum International (UNESCO. Paris). 1998. No. 199 (Vol. 50. No. 3. Oxford: Blackwell. p. 14.

王嵩山：《文化传译：博物馆与人类学想象》，台北：稻乡出版社 1990年版，第 4页。

Main Abstracts

Is this "Natural History" that "Natural History"? It is a Question.

Peng Zhaorong 1

"Natural History" is a broadly used reference and concept with diverse significance, and closely related to the words such as "museology", "natural history", "museum". However, the western and the Chinese connotations which are attached to these concepts, models and disciplines are widely different. This paper briefly studies this question by making a textual research, reorganization,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and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and pattern of "Bo Wu Ti" (博物体) used by China. The author deems that "Bo Wu Ti" not only promote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functions in respecting the cultural diversity of the world, and would be a sample for the Third World.

Dramatic Ritual/Ritual Drama: Performative and Reflexive Anthropology

Victor Tumer 36

Feelings and desires are not pollution of cognitive pure essence, but close to what we humanly are. Through taking part in the workshop to "explore the interface between ritual and the theatre...between social and aesthetic drama," and other limina betwee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performing arts, the author, with the case study on Ndembu village life,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cessual form of social conflict described by some anthropologists and genres of cultural performanc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anthropological and theatrical people was not only possible but also could become a major teaching tool for both sets of partners. To perform is to complete a more or less involved process rather than to do a single deed or act. The processual form of social dramas is implicit in aesthetic drama. Social drama's occurrence leads to a state of crisis which can be redressed by a series of ritual behaviors. The above mentioned cooperation involves an inter-transformation between ethnography, script and performance. The movement from ethnography to performance is a process of pragmatic reflexivity. Anthropology of performance should meet dramatic performers who are seeking some of their theoretical support from anthropology. The renewed emphasis is to regard society as a process punctuated by performances of various kinds.

On Story of Night - Blooming Cereus in Edition of Yuming Hall

Sun Shu - lei 45

Story of Night - Blooming Cereus by TU Long in edition of Yuming Hall at Nanjing Library is the unique copy of Ming Dynasty which is comparatively full and special, and it was published between the edition of Tianhui Mansion, new engraving with whole picture, and the edition of the first engraving of Jigu Mansion, re-engraving of *SIXTY DRAMAS*. According to the preface by the author himself of Yuming Hall Edition, the drama was written in the twenty fourth year of Wanli (1596), but not in the twenty sixth year of Wanli (1598). Besides, seeing from